



世纪前沿

[美] 赫伯特·金迪斯 萨缪·鲍尔斯等 著

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论丛

汪丁丁 叶 航 罗卫东 主编

人类的趋社会性 及其研究

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8-53
6

人类的趋社会性 及其研究

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

[美] 赫伯特·金迪斯 萨缪·鲍尔斯等 著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美)金迪斯 (Gintis, H.)等著；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08-05776-1

I. 人... II. ①金...②浙... III. 人的社会性—文集 IV. B03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1447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王志毅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

〔美〕金迪斯 鲍尔斯 等著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4.75

插页 4

字数 180,000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776-1/C·214

定价 24.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目录

何谓“社会科学根本问题”？
——为“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论丛”序/1 汪丁丁

导读一：人类合作秩序的起源与演化/8 汪丁丁 罗卫东 叶航

导读二：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行为及其经济学意义/27
叶航 汪丁丁 罗卫东

作者中译本序/48

人类合作的起源/52

社会资本和共同体治理/69

共同体的道德经济：结构化的人群和趋社会规范的演化/92

私有财产的演化/117

不平等的遗传/142

人类利他行为的解释/177

附录：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202

译名对照表/216

后记/220

何谓“社会科学根本问题”？

——为“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论丛”序

汪丁丁

为什么要追问“根本问题”？借用黑格尔的语言，一个核心概念在各向度上的充分展开，就是全部理论。再借用西美尔的类比，一旦康德开始追问“自然如何可能”的时候，他就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当西美尔追问“社会如何可能”的时候，他写出了一系列“社会理论”的基础论文；当我们追问社会科学根本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写出统一的社会科学。

在上述视角下审查人类知识的进步，我们意识到，全部人类知识，其实就是以追问根本问题的方式被激发、获取和积累起来的。人类知识的起点——哲学，始于对未知的“敬畏”，始于“爱智”，始于“天问”。从哲学当中，对“天”与“人”之间关系的追问，导致了道德哲学；由此又发展出两种叙事方式，其一是“科学”——陈述外在感受，其二是“人文”——陈述内在感受。叙事方式是思维的惯式——思维可以是一，惯式却可以有多。

沿着科学叙事的传统，对宇宙起源问题的关注导致了古代希腊语词所谓的“物理学”——在这一学科内部，根本问题分殊为各层次的和各方面的，就产生了星象学、几何学、化学、数学。对人类起源问题的关注导致了古代希腊语词所谓的“生物学”——在这一学科内部，根本

问题分殊为各层次的和各方面的，就产生了博物学、遗传学、医学。

沿着人文叙事的传统，对灵魂起源问题的关注导致了古代希腊语词所谓的“心理学”——在这一学科内部，根本问题分殊为各层次的和各方面的，就产生了丧葬、图腾、神话、神学、命理学。对思维与叙事方式的关注导致了古代希腊语词所谓的“逻辑学”（逻各斯）——在这一学科内部，根本问题分殊为各层次的和各方面的，就产生了修辞学、名学、语言学、符号学、脑科学。

第三，也是我们目前最为关注的，在科学叙事与人文叙事这两种思维惯式之间，始终存在着所谓的“跨学科”思维惯式。在西方思想史上，所谓“社会科学”，肇端于19世纪中叶，在生物学思想的主导下发展成为今天我们见到的样式。今天，社会科学领域内最偏向于科学叙事的部分，可以概括在“行为学”这一名称之下——它把人降低到动物现象的层次上加以研究。另一方面，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最偏向于人文叙事的部分，可以概括在“伦理学”这一名称之下——它把人提高到精神现象的层次上加以研究。

科学的与人文的叙事传统，以及传统内部积累起来的人类知识，依照康德的分类，呈现出沿时间的秩序和沿空间的秩序。前者称为“历史”，后者称为“结构”。

把历史与结构应用于社会科学，所谓“根本问题”，就表现为贯穿着社会科学全部历史的结构问题。我们打算论证，也不太相信科学的根本问题是惟一的。有鉴于此，我们采取了枚举法，来论证社会科学根本问题的存在性。

首先，社会科学是建立在关于“社会”的经验基础上的知识，故而在它的传统之内，它只承认获得了经验支持的知识表达。每一位认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都难以拒绝这样一项陈述：贯穿着人类社会以及社会性动物社会的历史的一类秩序——通常被称为“合作”——不论从行为学角度审视还是从伦理学角度审视，它对社会现象而言，都具有“根本”的意义。

其次，社会科学的知识，与科学知识类似，必须表达为关于“结构”的陈述。对于“合作”这类社会现象，每一位认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都难以拒绝关于合作秩序的结构的知识。因为合作的秩序，尤其是它的空间形态，是一切社会现象在科学叙事传统内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基础。

这样，我们不妨从一个特定角度把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定义为：“何种结构导致了合作？”注意，这里提出的定义，仅仅是从上述的特定角度提出来的。根据“对话的逻辑斯”的逻辑，任何根本问题的定义都不是惟一的。

何种结构导致了合作？这一问句包含了两个关键概念，其一是“结构”——人类知识沿空间的秩序，其二是“合作”。后者需要进一步界定，以免“社会科学”泛滥为“科学”。

古希腊人的科学叙事，据海德格尔考证，其特征在于把事物的“本质”放置于事物的发生演变过程当中，从而避免落入后来西方人落入的思维的形而上学陷阱。把合作秩序放置于演化过程中，这样获得的知识，我称之为“合作的发生学”。

就语义而言，“合作”指称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经验世界里与“竞争”关系相对比构成了足够显著的差异，以致我们更愿意把它命名为“合作”而不命名为“竞争”。2004年10月发表在《神经呈像》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合作关系和竞争关系激活了不同的脑区组合。这一事实表明，经过漫长的物种演化和社会演化，今天，合作与竞争的神经网络很可能激发出具有本质差异的人类情感。

合作现象的发生学要求我们在界定“合作”之前首先界定“个体”。如果我们关注的个体是人类个体，那么，合作就应当被理解为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类结构所导致的社会现象。如果我们关注的个体是单细胞，那么，合作就应当被理解为是细胞与细胞之间关系的某类结构所导致的社会现象。例如，生物学家非常熟悉的“共生”现象，

似乎是一种合作。当然，共生现象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由于相持不下而实现的竞争的均衡。

其实，共生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例子，来说明竞争与合作的结构辩证法和广义政治学。当竞争着的个体达成某种合作秩序时，从更高层次观察，它们似乎构成了一个更大的个体——“社会的个体”。另一方面，走进任何一个社会，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社会成员之间的竞争关系。我们甚至愿意承认：正是个体之间的竞争关系，界定了社会内部的“个体”概念。

于是，当竞争关系对观察者而言不十分显著时，“个体”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群体”。例如，典型意义上的“植物”——相对“动物”而言，被定义为“缺乏个体性的物种”。

这样，基于上述“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辩证法，我们甚至可以声称：所谓“合作的结构”，无非是与“竞争的结构”相比较而言，凸显为合作的那些结构。例如，在一家企业内部，其实存在着个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但就与市场里相互竞争着的许多企业之间的关系而言，企业内部的这些竞争关系可以被忽略，代之以合作关系。

更严格地说，一位经验主义者，或许可以把“社会”定义为：在单位时间内被观察到的不同时空点处的事件之间发生的足以引发观察者因果性联想的关系的频率达到了被观察者认为显著的程度，这些事件的全体，就构成一个社会。

不过，西美尔非常不赞同从观察者角度来定义“社会”，因为那样就有可能忽略社会成员之间的心理联系。作为对西美尔的批评的回应，我们可以把上面给出的经验主义的“社会”定义稍加拓展，让它能够包含“心理联系”——不同时空点处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仅是物理的而且可以是心理的。纯粹的心理联系，涵盖着西美尔定义过的“可社会性”。

社会如何可能？这一西美尔问题导致了“广义社会理论”的发展。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回答西美尔问题：社会因个体之间的合

作关系而成为可能。注意，这一回答导致了“社会科学”，从而比西美尔的理论更狭义和更具实证性。同时，这一回答所包含的说服力超过了另一种似乎与它等价的回答——“社会因个体之间的竞争关系而成为可能”。

当代经济学，由于它与“个体理性”概念和“理性选择”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在社会科学诸学科当中占有一种特殊的位置。从古典政治学家如斯密和小密尔，到新古典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和贝克尔，再到公共选择理论家如阿罗、森、布坎南，我们看到一群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关注经济学问题而且关注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

在经济学文献中，合作问题通常由“囚徒困境”一次博弈来刻画。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这一博弈的连续策略解，并在“合作”与“不合作”这两个极端之间引入连续的“合作度”。这样，合作就可以被视为基于生存竞争的个体理性选择，随着所选策略连续地趋于合作解，竞争着的一群个体就逐渐构成一个协调着的整体——“社会的个体”。

纳什最早把合作博弈刻画为竞争着的个体的理性选择过程——所谓“二人讨价还价问题”的解，及稍后发表的定义在“威胁”的策略集上的“二人合作博弈问题”的解。

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1661种1995年以来以英文出版的科学与社会科学期刊的大约13.4万期文章中搜索关键词“合作”，我得到了4209篇学术论文。以显著频率出现在这批文献里，与“囚徒困境博弈”的合作解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所谓“对等性”——英文是“reciprocity”，依场合不同常被译作“交互性”、“互惠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例如，在国际贸易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一份2004年9月发表的报告表明，国家之间的互惠交往是国际间合作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两国间地理距离的增加使交易费用上升，那么，两国间合作关系弱化的速度将比两国间冲突关系弱化的速度更慢些。换句话说，长期而

言，国际关系呈现出来的格局不是“远交近攻”而是“远攻近交”。推广而言，对地球人来说，外星人与地球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将大于地球上各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用社会学的语言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语言和交往导致了更多的了解。后者为人类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情感的与理性的基础，并且因此而发生的合作效应比因交往而发生的冲突效应更强烈。基于同样的原则，一个组织，它内部的人际之间的合作效应肯定比冲突效应更强烈。也因此，我们才可能观察到这一“组织”。

互惠性，在一位晚近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解释中，更主要的是一种相互惩罚的可能性——如果一方背叛了合作，那么另一方就有惩罚背叛者的冲动和权利。因为，对于方法论个人主义者而言，基于单纯互惠性的人类合作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金迪思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关于合作的“囚徒困境”博弈的策略集合内引入“惩罚”策略，可以极大地扩展合作的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

在一篇发表于2004年11月的论文中，接续着金迪思等人的思路，作者指出，对背叛合作者的惩罚，在组织内部比在组织外部更强烈。也因此，在地球上，同一区域内相邻各国之间的冲突关系甚至比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显著——因惩罚变得更加残酷而更显著。

翻译和收录在这套论丛的第一册（《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里的六篇论文，它们的主要作者是金迪思教授和鲍尔斯教授——两位长期合作研究的作者。金迪思196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6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数学硕士学位，1961年在宾州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鲍尔斯1965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60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鲍尔斯教授曾发表过论文批评萨缪尔森，并因此为我所知。此外，他1998年发表于权威刊物《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的综述型论文“内生偏好”，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自2000年起，鲍尔斯教授转任桑塔费研究院“经济学板块”的研究主任，从而成为所谓“桑塔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金迪思在麻省大学任教多年，晚近研究演化博弈论和博弈

论的演化并发表了专著《博弈论的演化》（*Game Theory Evolving*）。荣休之后，他转至桑塔费研究院，已经在那里发表了多篇工作论文。2005年1月，作为第一主编，他与鲍尔斯等三位主编共同出版了文集《道德情操与物质利益》（MIT出版社）。这部文集意味着西方学术界比以往更加关注斯密《道德情操论》的思想遗产，并试图在包括脑科学在内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过分关注和扭曲了的斯密《国富论》的思想遗产加以反省。

收录在这里的论文，旨在解释人类社会的一种超越普通动物界的现象——广泛存见于人类社会而不见于非人类社会的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作者们的这一努力，持续约十年时间，在至少五门不同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进行合作研究，今天，借助于脑科学研究手段，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关于这一突破性进展，在这套论丛的第二册（《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里收录了更细致的研究报告。

跨学科的努力，为着解答社会科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何种结构导致了合作？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故而要求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今天，根据我们的文献阅读，西方学者们正在从经济学、生物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演化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符号逻辑等领域，围绕合作的发生学问题进行合作研究。

通过这套论丛，我们由衷地希望国内读者注意到社会科学研究在过去十年所经历的这一方向性转变，注意到这一转变很可能引发的革命性后果，并尽快参与这些预期将成为社会科学前沿课题的研究。还是那句话：我们把这套论丛献给未来的社会科学家们的。

导读一：

人类合作秩序的起源与演化^{*}

汪丁丁 罗卫东 叶 航

—

汪丁丁：我想从两个角度，把这次报告的主题引出来。其实，我们今天的报告是一个跨学科问题。阐释这个问题，仅仅依靠经济学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整个社会科学的视角上，用一种统一和演化的社会理论来谈人类的合作秩序。

从演化社会理论谈这个问题，有两个角度可以切入。第一，我们假设，一个外星人突然来到我们地球，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想知道，统治这个星球的动物，即我们人类究竟是怎么回事。作为外星人，他不会去考虑你是怎么行动的，你的动机是什么，或者你的行为背后是什么理论体系。他要把握的其实是最简单、最直观或者最宏观的事实，即这种动物以什么方式来实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从这个角度，外星人也许会发现，人类首先是以个体为单位进行活动的，不像其他动

^{*} 本文是三位作者根据他们2005年4月22—24日在南京理工大学的演讲内容修改整理而成，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三期。

物那样一群一群地居住。维系人类个体之间联系的有两种主要形态，第一种叫竞争关系，这是经济学家很强调的关系，它导致了效率，导致了很多很多或好或坏的东西。但外星人显然还会注意到另外一种关系，即人类之间的合作关系。就我这个地球人来说，我不知道人类的这两种关系究竟哪个更重要。我到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竞争关系和合作关系究竟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但我可以找出最新的研究文献，表明人类对合作的兴趣，最起码在生物脑演化的阶段上早于人类的竞争关系。你别看我们经济学家谈竞争谈了那么多，其实合作的重要性不亚于竞争的重要性，只不过经济学家不谈，或者很少谈到。这是主流经济学很大的一个不足，是需要我们来改变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讨论合作关系，因为竞争关系谈得太多了。就竞争关系而言，在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里面经常讲到，经济学的原理只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当然这是就芝加哥学派的口述传统而言的，一般教科书很少把它当成一个核心的概念——那就是“替代性”。各位在教科书里面看到“替代性”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平常、很普通，其实它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所谓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机会成本甚至理性选择等等，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资源之间或者事物之间的可替代性上。但我们今天谈的是合作关系，那么合作关系的核心理念是什么？相对于竞争关系的核心理念，我们有一个关于合作关系的核心理念，即“互补性”。这个在芝加哥学派的口述传统里面也出现很多次了，只不过像加里·贝克尔这样的领袖人物注意到了，但是他不怎么说，也不怎么写文章谈这件事情。就人类的合作关系来说，“互补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万事万物之间，不仅仅有非此即彼的“替代性”，而且还有相辅相成的“互补性”。前者导致了我们的竞争关系，而后者导致了我们的合作关系。

这两个核心理念我把它放在这儿了，它们的含义是什么？从个体之间的竞争关系我们可以推出的核心理念是“替代性”，它意味着个性的发展；事物的可替代性导致竞争，竞争导致专业化，专业化导致今天

气象万千的个性化世界。从个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可以推出的核心概念是“互补性”，它意味着群体的发展；事物的可互补性导致合作，合作导致社会化，社会化导致今天气象万千的共生化世界。

上面是我说的第一个角度，再从第二个角度看我们今天报告的主题。外星人走了，现在轮到地球人自己解释这件事情了。于是就有所谓的理论家出来发表言论，理论家的任务是要从现象和经验观察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比如通过观察天体运动推出牛顿三大定律，即给经验的世界建模。那么，传统的经济学家是怎么给人类行为建模的呢？他们建立的模型是所谓“理性选择”模型。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就不解释了，这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范式。

但现在的问题是，仅仅用所谓的“理性选择”是否能够解释人类的全部行为，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在外星人看来显而易见的人类合作行为？社会学家和一部分重要的经济学家，甚至像马歇尔这样的现代经济学创始人都承认，有两个主要因素影响或者决定了人类的行为。哪两个因素？在中文传统里叫“情”与“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八版的前言里说，决定我们人类行为最根本、最长远的力量，一个是经济，另一个是宗教。^[1]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一种情感。所以“情”与“理”是无法割裂的，在人类的选择行为中是两个基本的支点。我们人类的理性从来就不是冷酷的、不带情感的理性。

在以往的经济学教科书和主流经济学家的文章里，理性变成了不可爱的理性，变成了没有情感、社会正义和道德意识的理性，变成了冷酷的市场计算——“威尼斯商人身上的一磅肉”。我们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注意到了最近10年西方经济学理论发生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很微妙，是由主流经济学家自己意识到的，并且由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带头调整了方向，开始转到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上。在这一研究方向上，除了经济学，还有脑科学、认知科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演化心理学的参与。如果纯粹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经济学家正在试图把人类的情感因素综合到博弈论的框架里面来。

2001年，一份很重要的学术刊物《经济行为与组织》(*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带有同情心的囚徒困境博弈”^[2]，它的主要结论是同情心的存在可以在单次囚徒困境中导致合作。根据作者所做的博弈实验，在单次囚徒困境条件下，参与者的同情心越强，参与者之间同情共感的距离越近，合作就越容易实现。作者引进了一个度量心理距离的参数，结果发现这个参数与合作的概率完全成反比。人们的心理距离越小，合作发生的概率就越大。当这个参数收敛到某一个域值或者某一个点的时候，参与者几乎百分之百的合作。在这个点之前有一个区域，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部分合作，一部分不合作。作者挑选的实验者，都是同一所大学的学生。挑选的标准是，他们之间必须是互相熟悉并共同相处一年以上，只有这样才能度量他们的同情心。通过博弈实验，他们得到了一些非常可信的数据。比如，作者发现同情心并不是对称的，我同情你的时候，你未必就同等程度地同情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情况，作者把它叫做“同情者的礼物”：我情愿单方面和你合作，甚至明明知道你会背叛我、出卖我，我也毫无怨言地作出“牺牲”，仅仅因为我可怜你、爱你或者崇拜你。

上述现象都是把同情心引进了博弈论以后出现的新观察，或者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说明我们的决策行为，甚至在单次囚徒困境条件下也是无法离开情感因素的。它说明，“情”这个东西，在今天主流经济学家的眼睛里，已经不再像以前西方传统里的“情”一样，是可以和“理”完全分开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研究称作“理”的情感化研究，它几乎和中国的传统看法一样，因为在中国人眼里，“情理”两个字从来就是合一的、连在一起的。

我们综述了很多西方的文献，加上中国人的理解。因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处于两个极不相同的文化传统，很天然地成为相互的他者，或者是对方的镜子。在西方长大的西方经济学家、社会理论家，不能自觉地知道他自己的局限性。我们作为西方传统之外的学者，往往很容易看到他们的局限性，这样就可以加以补充，作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贡